

# 2

向大陸擴張

# 01

## 上海成為進軍大陸的大本營

---

1842年，英國政府以堅船利炮，逼積弱無能的清王朝簽訂城下之盟，不但侵佔了香港，而且打開了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的門戶。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五口對外通商，無疑給急於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商帶來巨大的貿易及投資機會。從香港、廣州出發的英資洋行，立刻向上海等五口發動新一輪的擴張攻勢。

以風光綺麗的上海外灘為大本營，憑藉著西方列強攫取的種種特權，英資洋行迅速將其勢力伸延到沿海及長江流域各通商口岸，深入到中國廣闊的經濟腹地。在逾一個世紀的歷史歲月中，一批聞名遠東的英資財團乘時而起，其中的佼佼者，有號稱“洋行之王”的怡和、被譽為中國航運業巨擘的太古，以及主宰中國金融業的滙豐。

上海成為英資洋行進軍中國的大本營，絕非偶然。上海地處中國漫長海岸線的中點，它北扼長江入海的咽喉，西面連接富饒美麗的長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水網沃野，東南面瀕臨太平洋。透過長江航道，上海以縱橫十數省，擁有近2億人口的長江流域作為其廣闊的經濟腹地。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為一個天然港口，並為近代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極其良好的基礎。

上海建制於南宋末，早在元朝已成為中國國內交通運輸的重鎮，清朝嘉慶年間，上海已享有“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盛譽。1832年，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林賽曾隨“阿美士德號”考察上海，他一到上海即被上海卓越的地理位置所震懾：黃浦江面停泊著眾多南來北往的船隻，這些船隻來自北面的天津、奉天，南面的福建、台灣、廣州以及東南亞。林賽即意識到，上海享有中國南北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可壟斷國內的貿易。<sup>❶</sup>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長江流域，英資洋行可從上海直達漢口，並從此深入中國更深的腹地，上海的戰略地位更形重要。

### » 英資洋行進駐上海

1843年11月17日，根據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海由英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宣佈正式開埠。1845年11月，巴富爾脅迫上海道台宮慕久商訂《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建立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第一個租界。最初



1920 年代末的上海外灘。上海成為英資洋行和銀行進軍中國的大本營。

的英租界以上海外灘為中心，東臨黃浦江，南至洋涇濱（今延安東路），西迄邊路（今河南中路），北至李家莊（今北京東路），面積 830 畝。其後，英租界一再擴大，1863 年和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面積已達 1.4 萬畝。到 1925 年，公共租界再擴大到 4.8 萬畝，其時法租界亦達 1.5 萬畝。到 20 世紀 30 年代初，上海租界共擁有人口 144 萬，幾乎佔當時上海總人口的二分之一，成為上海最繁華的市區。

1854 年，上海租界設立了獨立的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自此，租界逐漸演變成中國政府無法控制的“獨立自治國”。這種局面的形成，是西方列強以武力為後盾，利用清政府的積弱無能所致，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不過，從另一角度看，租界的建立，客觀上又形成了近代上海優越的投資環境。租界在政治上的獨立，是租界不受中國內戰騷擾、維持穩定及安全的保障。租界實施西方社會的政策、規章和法律、稅收穩定及行政效率高，有利於工商界的投資。因此，租界的形成和發展，是英

資洋行在上海建立大本營的一個重要因素，亦是外資工商業和中國民族工業在上海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1843 年，就在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到達上海的同時，首批英資洋行亦最早進入上海，它們包括怡和洋行、寶順洋行、仁記洋行和義記洋行。當時，到達上海的外商共 25 人，他們一面在上海城內租屋安頓，一面在城外外灘沿江地帶覓地建房，設立洋行、倉庫和臨時碼頭。1847 年，也就是《上海租地章程》簽訂後兩年，外灘已設立 24 家洋行、5 家洋商店舖，以及旅館和俱樂部各 1 家。隨著租界的擴大，洋行不斷增多，到 1852 年，也就是洪秀全的太平軍進入江南的前一年，上海租界設立的洋行已增加到 41 家；其中，英資洋行 35 家（包括屬大英帝國的印度帕西族洋行 8 家）、美資洋行 5 家、法資洋行 1 家。<sup>②</sup>這時，租界裡還設立了許多為適應進出口貿易的拍賣行、倉棧以及海船用品和伙食供應等商店，創辦了英文《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大英醫院，並成立了英國商會。

到 19 世紀 50 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各式洋行逾 120 家，其中最重要的幾乎都集中在外灘。根據 1857 年英租界外灘地圖，從英國領事館開始，由北至南濱臨黃浦江的洋行和銀行是：怡和洋行、鐵行輪船公司、沙遜洋行、仁記洋行、瓊記洋行、東方銀行、蕭氏兄弟洋行、寶順洋行、圖諾爾洋行、華記洋行、旗昌洋行、會德豐洋行、天長洋行和裕豐洋行等。英國領事館迤南，是綿延不絕、鱗次櫛比的西式建築物，上面飄揚著洋行的各式旗幟，頗為壯觀。這些洋行，大都是東印度公司壟斷時期即在廣州從事鴉片貿易的老牌洋行。它們從販賣鴉片發財致富，積累了龐大資本。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批洋行又同英國紡織集團結合，在對華貿易中佔絕大比重，擁有很大勢力。當然，亦有另一類洋行，如公易洋行、義記洋行、泰和洋行、豐茂洋行、祥泰洋行、公平洋行、李百里洋行、裕記洋行，以及稍後進入上海的太古洋行等，這些洋行都是東印度公司在華壟斷結束以及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它們規模較小、戶數較多，一般都以經營紡織品為主。上海開埠後，這兩類洋行都先後在這裡開設辦事處，很快，外灘成為了外商尤其是英商在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的大本營。

表 2-1 上海部份外資洋行一覽

行名	國籍	進入年份	業務範圍	資本額	地址
旗昌洋行	美	1846 年	早期販賣鴉片，後主要經營進口棉花及出口土特產	—	—
怡和洋行	英	1843 年	早期販賣鴉片，後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保險、地產、航運、鐵路、碼頭倉庫、公用事業、工業、航空等	1,000 萬港元	中山東一路 27 號
會德豐	英	1860 年	航運、銀行、股票、保險、倉庫、房地產等	—	延安東路 110 號
永興洋行	法	1869 年	進出口貿易、保險代理、機器打包及倉庫	規銀 50 萬兩	虎丘路 95 號
祥茂洋行	英	1892 年	進出口貿易	20 萬港元	中山東一路 1 號
老公茂股份	英	1875 年	白鐵、白鉛、紫銅進口	紋銀 400 萬兩	廣東路 17 號
天祥洋行	英	1898 年	進口機器、工業原料、西藥等	50 萬英鎊	廣東路 7 號
沙遜洋行	英		早期進口鴉片、進口印度棉花、地產及金融投機	規銀 1,000 萬兩	南京東路 20 號
太古洋行	英	1866 年	船舶代理及輪船業務	500 萬英鎊	福州路四川中路轉角
隆茂股份	英	1873 年	代理美國最大駝毛及開司米呢貨廠產品	770 萬港元	廣東路 77 號
寶隆洋行	丹麥	1900 年	輪船代理及進出口業務	5,000 萬丹麥克朗	廣東路 17 號
屈臣氏藥房	英	1860 年	製造銷售西藥並配方	10 萬港元	南京東路 71 號、南京西路 1175 號、淮海中路 965 號

資料來源：張弘任：《舊上海部份外商機構一覽表》，中國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56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58-299 頁。

## » 上海英資洋行的進出口貿易

由於當時中國尚處於自給自足的經濟環境，五口通商並未如洋行大班們所期望，為英國的工業品打開龐大的中國市場。當時，洋行的業務仍以鴉片的輸入和茶葉、絲綢的輸出為主要內容。上海一開埠，怡和洋行的一艘載重 423 噸的鴉片躉船就駛入吳淞口外，其他鴉片販子的鴉片船也接踵而來。開埠不久，上海的鴉片貿易即急劇上升，1847 年，洋行在吳淞口外躉船上售出的鴉片已達 16,500 箱，這個數字比 1830 年以前任何一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都多。到 1856 年，從上海輸入的鴉片已增加到 33,069 箱，比 1847 年翻了一番。這一時期，鴉片貿易一般接近上海進口商品總值的四分之三，而棉毛織品、雜貨則只佔四分之一稍強。所有權威人士一致認為，直到 19 世紀最後 10 年之前，鴉片一直是中國進口商品的主要項目。

鴉片貿易中，仍以怡和洋行、寶順洋行、旗昌洋行佔據壟斷優勢，1851 年輸入上海的鴉片船共 58 艘，其中屬三大洋行的有 43 艘，如按鴉片進口總值平均估算，每艘貨值約 20 萬元，共 890 萬元，僅鴉片一項，三大洋行的進口鴉片貨值就佔鴉片進口的 74%，佔上海該年進口商品總值的 55%。<sup>③</sup> 三大洋行中，怡和洋行始終居第一位，從 1845 年起，怡和洋行便動用 14 艘武裝躉船停泊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其中 3 艘停泊在吳淞口外。到 1850 年，上海已成為怡和洋行的鴉片貿易中心。它透過香港總行和上海的辦事處，指揮在中國沿海各地的鴉片接收站、分行以及在倫敦、印度的聯號或代理人，及時交換關於鴉片、絲茶的行情，以及金銀比價等情報，利用中國的鴉片走私販的銷售系統，通過與清政府官員的經濟（貸款之類）往來和日常接觸，始終維持鴉片價格的壟斷和貿易的領先地位。<sup>④</sup>

這一時期，中國的茶葉、生絲繼續成為歐美各國的暢銷產品。上海地處長江口，透過長江及江南密集的水網通向中國最富庶的蘇、淞、杭、嘉、湖地區乃至更深腹地，與著名的江、浙、皖三省絲茶產地相距不遠。上海的絲、茶出口遂蓬勃發展。據統計，1845 年上海的生絲出口 6,400 包，到 1850 年已急增到 17,000 包，超過廣州水平。到 5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生絲幾乎全部從上海出口。茶葉出口的重心亦明顯從廣州移向上海，到 1855 年，從上海出口的茶葉已超過 8,000 萬磅，僅從上海運往美

國銷售的茶葉就比廣州出口的全部茶葉還要多。<sup>6</sup> 當時，西方國家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茶、絲兩項，一旦茶、絲貿易中心移向上海，作為進口大宗的鴉片貿易亦必然隨之而來，整個對外貿易的重心就從廣州移到上海。

19世紀50年代，主要在中國南部進行的太平天國戰爭也沒能阻止對外貿易北移的這種趨勢。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長江，外商可從上海直達漢口，並由此進入中國更深的腹地，上海西側長江流域的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縱深度得到空前的發展。上海北面的沿海城市，包括天津、營口、煙台等也相繼闢為商埠，這些口岸的貿易絕大部份都通過上海中轉。到60年代末，上海對外貿易出口總值持續超過3,000萬海關兩，約相當於廣州出口額的3-4倍；而進口總值則超過4,900萬海關兩，約為廣州進口的9倍。這種比例在60年代以後基本維持著，而廣州以外的其他口岸對外貿易，除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新開的漢口增長較快外，在同期都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因此，從60年代起，上海已不可逆轉地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

上海英資洋行的進出口貿易，以怡和洋行、新沙遜洋行最具代表性。怡和洋行將在下節展開。新沙遜洋行源自沙遜洋行。沙遜洋行於1844年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之



老沙遜洋行在上海的總部。1845年由英籍猶太人愛德華·沙遜在上海創辦。

後，亦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1864年，大衛·沙遜逝世後，他的兒子阿爾伯特·大衛·沙遜（1818-1896）繼承了家族公司業務，後稱老沙遜洋行；而另一個兒子伊利亞斯·大衛·沙遜（Elias David Sassoon）則於1872年獨自開設了另一家沙遜洋行，故稱為新沙遜洋行。新沙遜洋行設於上海仁記路5號（今滇池路和平飯店後門），佔地60餘畝。1880年伊利亞斯病逝後，洋行由其長子雅各（Jacob）繼承。第三代主持人是維克多·沙遜（Victor Sassoon），因為是一瘸子，人稱“翹腳沙遜”，因祖輩都封為爵士，又稱他為“沙遜爵士”。在他的支持下，新沙遜洋行業務發展迅速，其影響已遠遠超過了老沙遜洋行。

新沙遜洋行創辦後，開始設有洋布間、地產間和保險間等部門，不過，地產間規模很小，僅僅有一兩個猶太籍職員，保險間亦只是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險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的業務，但洋布間則規模較大，訂貨客戶眾多，業務發達。上海天津路一帶的保泰、久大、同盛、宏昌等洋布商舖，南京路的同茂盛，以及著名的信大祥、寶大祥、協大祥三大洋布商號，都是它的客戶。新沙遜經銷的棉紡織品，數量最多的是衝泰西緞，暢銷中國各地，新沙遜從英國曼徹斯特、利物浦及格拉斯哥等地進貨，又從印度孟買購入棉花、棉紗、漂細布（竹布）、市布（龍頭細布）等，運到中國銷售。這些訂貨一年兩期，每年營業總額約值規銀<sup>6</sup>150萬兩。<sup>7</sup>

後來，生意越做越大，新沙遜將洋布間改為進口部，兼營汽車零件、荷蘭砂糖、人造絲、大小五金、寶塔牌麻紗手帕、紙張、玻璃器皿洋釘、三角鐵、水泥、銅片、鋼片等，又做出口生意，出口芝麻、豬鬃、蛋白乾、蛋黃乾、桐油、腸衣等特產。這些生意按照慣例均由洋行買辦具體負責，由洋行給予買辦2%的回佣作為報酬。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英國貨受到抵制，上海洋布客戶改為與日本洋行做生意，新沙遜於是與意大利的利司尼亞廠簽訂合同，獨家經營該廠的人造絲，使得上海一些有名的洋布行，如孔士、華嘉等洋行均來進貨，每年營業額達規銀250萬。

新沙遜在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同時，又積極拓展地產業務。早在1877年剛成立不久，新沙遜以規銀8萬兩購入今和平飯店地段，取名“漢特產業”，其後又相繼在南京路及上海各地購入土地物業。到1900年已擁有房地產29處，共計面積364畝。

1925年，新沙遜將原行址拆卸重建，1928年新大廈落成，定名為沙遜大廈，一部份作為洋行行址，一部份開設華懋飯店，公司名稱也正式改為新沙遜股份有限公司（E. D. Sassoon & Co., Ltd.），總部設在英國倫敦，上海設分公司，在香港註冊。這時，正值安利洋行（Arnhold & Co.）擴張過快，資金周轉不靈，新沙遜乘機將其吞併，改組為安利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新沙遜先後組建漢彌爾登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地產股份有限公司、遠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東方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華懋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等，形成一個龐大的地產集團，新沙遜老闆維克多也因而被稱為“房地產大王”。<sup>⑧</sup>此外，新沙遜還經營華懋飯店、華懋洗衣公司、上海啤酒廠、中國公共汽車公司、都城飯店、國泰大戲院及仙樂舞廳等多種業務。

這一時期，新沙遜洋行也積極投資國外的製造業和金融業，在英國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開設大規模的紡織廠、銀公司、呢絨廠、人造絲廠等，在美國紐約投資紐約銀行家信託公司，在印度開辦孟買棉花廠、萊蒙紡織廠、孟買信託銀公司，儼然成為一家跨國性大型綜合企業。

## » 上海英資航運公司的發展

以鴉片、茶葉、生絲為大宗的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不但為上海的外資洋行帶來巨額的利潤，而且刺激了他們對航運業的投資。上海開埠之後，英商在航運業中就已處於領先地位，1849年進入上海的133艘外國船隻中，英國船隻就有94艘。1850年鐵行輪船公司將它從歐洲到香港的航線伸延到上海，撥出“瑪麗·伍德號”定期航行香港與上海及其間各口岸的航線。從1851年起，鐵行將每月一班的航行改為每兩週一次，它以運載鴉片和金銀出名，在上海，它還承擔大量的生絲出口運輸。據估計，僅1860年它從上海承運的生絲就達5萬件，收取運費16.2萬英鎊。連英國商人也承認：“鐵行公司的董事們同中國的交易全是史無前例的最賺錢的買賣。這家公司長期得到英國政府高達40、50萬英鎊的財政資助，在一段時間內幾乎壟斷了上海到香港的海上運輸。”

不過，從60年代起，情形發生了很大變化，法國郵船公司、美國太平洋郵船公

司、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等相繼加入該航線，鐵行遇到了激烈的競爭。這時，航運業開始從鴉片、茶絲貿易的附屬地位中擺脫出來，取得獨立地位。據統計，60年代初期上海約有20家洋行各自擁1、2艘輪船，航行於沿海口岸及長江航線，上海稍具規模的洋行幾乎都配置輪船參與長江航運的競爭。1861年瓊記洋行的輪船“火箭號”開抵上海，怡和洋行的輪船開始停泊天津、牛莊。當時，沿海北洋航線和長江航線成為各洋行爭相追逐的目標。這些航線利潤優厚，600海里短程航線的運價，竟比中國到英國的遠洋運價還高，而上海至漢口間的航線，貨運運價每噸高達白銀25兩，一條輪船“往返一次的運費收入，即足敷船價成本”<sup>⑨</sup>。

其後參加激烈角逐的，尚有實力雄厚的美資旗昌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創辦於1862年3月27日，資本200萬兩白銀，由旗昌洋行任永久代理人，主持者是旗昌洋行大班、曾任美國駐上海代理領事、上海租界工部局總董金能亨。當年，旗昌即以“驚異號”首闢滬漢線，開啟上海至漢口航運之端。1863年5月，旗昌輪船公司在《上海新報》宣稱，已將5艘“上等堅固快捷輪船”開進長江，“專載客商往來貨物搭客”，並以“降低運價”和“在保險和儲運方面”給予貨主種種優待。1866年，旗昌輪船公司以55萬兩鉅款收購破產的寶順洋行全部輪船設備和船塢，實力大增。1867年，旗昌輪船公司與怡和等達成為期10年協議，旗昌壟斷長江航運，而怡和洋行則壟斷寧波以外的上海以南沿海航線。

當時，旗昌輪船公司是長江航運的霸主，但怡和洋行卻透過其買辦唐景星主持的英國公正輪船公司和華商北清輪船公司分別參與了長江航運和沿海北洋航運。旗昌輪船公司獨霸長江的局面未能維持10年就發生變化，異軍突起的是1872年太古洋行創辦的太古輪船公司，它以大幅降價的辦法向旗昌在長江的壟斷地位發起挑戰。經過激烈的競爭，終於迫使旗昌在1874年與它達成長江航運聯營協議，旗昌獨霸長江航運的局面就此結束。1881年，怡和洋行創辦印—華輪船公司，從此，以太古、怡和為首的英資輪船公司成為中國內河及沿海航運的主力。

隨著航運業的發展，從上海開闢的航線不斷向遠洋、近海、沿海、長江與內河伸延，形成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航運網絡，以上海為起迄港和中轉站的航線有100條左右，上海迅速崛起為中國的航運中心。

## » 上海英資銀行的發展

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也刺激了英資銀行業的發展。最早進入上海的英資銀行是麗如銀行（即香港的東藩匯理銀行），1848年在黃浦灘路11號設立分行，它也是中國第一家外資銀行。繼麗如銀行之後，50年代以後陸續進入上海的有：有利銀行、呵加刺銀行、匯隆銀行、麥加利銀行（即香港的渣打銀行）、利中銀行、利商銀行、匯泉銀行及法蘭西銀行。這些銀行主要集中在英租界黃浦灘路附近，形成上海早期的金融中心區。

當時，銀行的主要業務是匯兌，它們主要為鴉片、絲茶貿易服務。如最早設立的麗如銀行，實際上僅是個“國外匯票的經紀人”。1852年8月7日，《北華捷報》刊登了一封商人的公開信，他指責麗如銀行：“不管它在別處如何，在上海我認為它不能算作銀行。他們沒有執行銀行本身的職能，或者說，沒有經營銀行原來的生意，他們只是做國外匯票的經紀人，而經紀匯票是商人獨享的一項合法業務，從來不是一項銀行家的業務。”即使是匯兌業務，銀行的生意也常常趕不上一些大洋行代理店。當時上海的匯票買賣並不很興旺，在報紙上可以看到匯票求售的廣告，就像出售奶油、乳酪一樣徵求買主，只有直接經營鴉片的大洋行，如怡和洋行等，才獨享買賣外匯的優勢。

19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內戰引起歐洲棉花恐慌，上海成為中國棉花出口的主要口岸，這導致了1864年上海金融熱潮。不過，這種虛假的“繁榮”很快隨著美國內戰的結束而消退。1866年，上海與香港一樣，出現開埠以來的最大金融恐慌，呵加刺、利中、利商、匯泉等銀行紛紛倒閉，就是50年代在上海已站穩腳跟的匯隆銀行亦不能倖免。

這時，英資銀行還沒能形成一股控制中國金融的勢力，但這種勢力已在醞釀中。1865年，總行設在香港的滙豐銀行創立，同年它在上海開設分行。滙豐銀行開業後不到一年，就遇上來勢兇猛的金融風潮，但由於它得到上海主要英資洋行的支援，不僅渡過這場危機，而且在危機中嶄露頭角。當時，各銀行紛紛縮短匯票支付期限，以減低風險，滙豐銀行卻敢於開出期限較長的匯票，受到中小商人的支持。自此，滙豐逐漸崛起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外資銀行。

19世紀70年代以後，上海已逐漸發展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到80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國對外貿易的款項調撥總額中已佔80%。這一時期，配合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滲透，各國銀行相繼進入上海。1890年，德國的德華銀行在上海開辦；其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1893）、俄國的俄華道勝銀行（1896）、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1899）、比利時的華比銀行（1902）、美國的花旗銀行（即萬國寶通銀行，1902）及荷蘭的荷

表 2-2 上海部份外資銀行一覽

行名	國籍	年份	業務範圍	資本額	地址
麥加利銀行	英	1858年	銀行業務	總行設於倫敦，資本額300萬英鎊	中山東一路18號
滙豐銀行	英	1865年	銀行業務	總行設於香港，資本額500萬港元	中山東一路10號
德華銀行	德	1889年	銀行業務	—	—
橫濱正金銀行	日	1893年	銀行業務	—	—
中英公司	英	1898年	銀行及實業	怡和與滙豐合資	—
東方匯理銀行	法	1899年	進出口押款為主，存放款為次	127.5萬英鎊	中山東一路29號
花旗銀行	美	1902年	存放匯款，國際匯兌	—	—
華比銀行	比利時	1902年	銀行業務	—	中山東一路20號
有利銀行	英	1915年	以國際匯兌為主	—	中山東一路4號
沙遜銀行	英	1930年	銀行業務	在香港註冊	—
友邦銀行	美	1930年	銀行業務	由總行劃撥法幣100萬元	中山東一路17號
美國商業銀行	美	1949年	出售旅行支票為主	總行資本1,280萬美元，上海分行生財資金14萬美元	—

資料來源：張弘任：《舊上海部份外商機構一覽表》，中國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8-299頁。

蘭銀行（1903）等相繼在上海黃浦灘路附近開業。這樣，黃浦灘路一帶形成了一個外國銀行集中地，成為當時中國的“華爾街”。這時期的外國銀行，不僅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匯兌業務，而且在中國發行鈔票，經營中國的借款和賠款，並通過操縱中國的金融和向清政府貸款，成為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金融工具。

各國銀行的相繼開辦，打破了英資銀行獨佔的局面。不過，以滙豐銀行為首的英資銀行依然在上海金融業中居於領先地位。憑藉著滙豐銀行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掌握中國海關大權長達半個世紀的英國人赫德的支持（赫德被稱為“滙豐銀行貸款的幕後策劃者”<sup>10</sup>），滙豐取得了對華財政、鐵路、礦山等方面貸款的優先權，儼然成為清政府的財務總管、主要的往來銀行。這一時期，滙豐銀行在中國的勢力如日中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在中國銀行業的勢力此消彼長，德華銀行和俄華道勝銀行先後停業，而美、日銀行的力量迅速增加，但以滙豐、麥加利為首的英資銀行仍繼續保持優勢。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銀行獨霸的時期。二次大戰後，美國在華勢力超過西方各國，滙豐銀行的地位才開始動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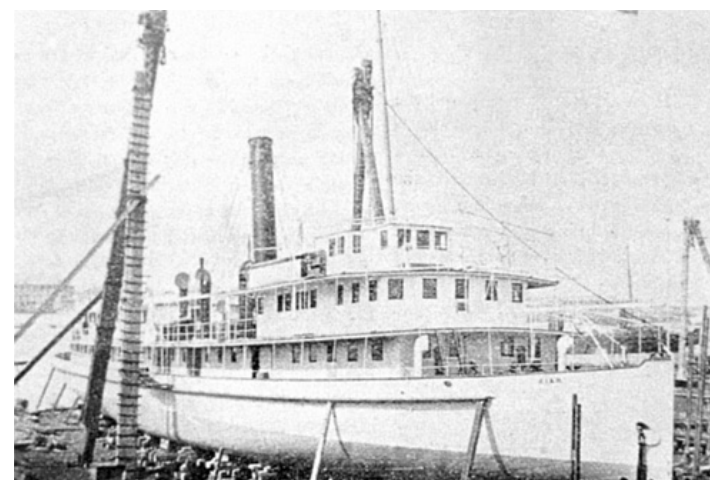
## » 上海英資洋行對工業的投資

從 19 世紀 70 年代起，西方列強開始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已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英資洋行，逐步將投資的重點轉向鐵路、工廠、礦山等領域。最早的工業投資是為發展航運業而經營的船塢，稍後是利用中國原料而經營的加工工業，主要是繅絲、製磚茶、製糖和軋花等，還有少數是專為在中國市場銷售的若干輕工業，如火柴、肥皂、麵粉、捲煙等等，以及應用在租界的公用事業。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最初幾年，為鴉片、茶絲貿易服務的船塢都集中在廣州、香港。隨著貿易中心北移上海，船塢陸續在上海出現。19 世紀 50 年代，美國人先後在上海創辦了幾個小船塢，到 60 年代，英商擠垮了早期美資創辦的小船廠而稱雄上海。1862 年成立的祥生船廠和 1865 年成立的耶松船廠是當時上海造船業的兩大巨頭。90 年代初，祥生和耶松已成為各擁有資本 80 萬兩和 75 萬兩的大型企業。這兩家船廠，不但修理當時遠航來滬的各種大型船隻，還經常為怡和、太古等輪船公司，

上海、天津的拖駁公司以及中國海關、招商局等修造各種輪船、拖船、炮艦和貨船。1884 年，怡和洋行的 2,000 噸輪船，便是耶松船廠製造的。1900 年，兩家船廠合營，改組為新的耶松公司，當時資本達 557 萬兩，擁有 6 個大船塢、1 個機器製造廠，其後更發展為英資在中國的最大企業之一，壟斷了整個中國的船塢業。

上海開埠初期，生絲的出口所佔的地位僅次於茶葉。當時，生絲是農村個體農戶的手工業產品，主要缺點是條紋不均，不適合機器織網，運到歐洲絲廠使用前，往往需要重繅，且損耗過多。因此，英資洋行很早就想在中國開設繅廠。1861 年，當時西方列強尚未取得在華開設工廠的權利，怡和洋行私下運入 100 架意大利式繅絲機器，在上海創辦怡和紡絲局。該廠是外資在上海設立的第一家繅絲廠，它一創辦就受



1865 年英商創辦的耶松船廠（上圖）及所造輪船（下圖）。該船行後發展成英資在中國的最大企業之一，壟斷了中國的船塢業。



到中國商人的強烈抵制，結果不到數年便關閉。

到 19 世紀 80 年代，上海的繅絲業已起步發展。1882 年，怡和捲土重來，在上海新開路開設怡和絲廠，期間，英資的綸昌、公平絲廠，美資的寶昌、乾康絲廠，法資的信昌絲廠，德資的瑞綸絲廠先後設立，到甲午戰爭前夕，上海已有外資絲繅廠 8 家，資本估計在 400 萬兩銀元以上，僱用中國工人近 6,000 人，上海租界成為中國絲繅業中心。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攫取了在中國領土上開設工廠及採礦的特權，其他西方國家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也獲得同樣特權。這一時期，外商在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投資的領域擴展到紡織、食品、礦冶、機器製造等部門。據統計，從 1895-1913 年間，外商在華投資的工礦企業（資本在 10 萬銀元以上）達 136 家，投資總額達 1.03 億銀元。其中，英商設立的達 37 家、資本額 4,868 萬銀元，日商開設的 49 家、資本額 2,633 萬銀元，德商開設的 12 家、資本額 768 萬銀元，俄商開設的 17 家、資本額 665 萬銀元，法商開設的 6 家、資本額 460 萬銀元，美商開設的 8 家、資本額 324 萬銀元。以資本額計算，英商仍居首位。這些企業，約四成集中在上海，可見，到 20 世紀初，上海已成為中國近代最早期的工業中心。

對工業投資最龐大的英商，要數怡和洋行和英美煙草公司。怡和洋行從販賣鴉片起家，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因而最早開始對華工業投資。1895 年甲午戰爭以前，它已在中國開辦了 8 家工廠，其中 3 家在上海，投資規模在外資工業中居首位。甲午戰爭後，怡和洋行對工業的投資迅速擴大到包括造船、礦冶、機器製造、紡織、製糖、繅絲、煙草，以及水、電等公用事業等多個領域。到 1914 年，怡和擁有的工礦企業已達三十多個，資本額達 4,000 萬銀元以上，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壟斷財團。

英資另一家地位顯赫的壟斷集團是英美煙草公司，它於 1902 年在倫敦註冊成立，由當時英、美兩國六大煙草公司共同出資組成，大股東是英國的帝國煙草公司和美國煙草公司。同年 9 月，它在上海設立分公司——駐華英美煙草公司，最初投資只有 21 萬銀元。它先在浦東設立一間煙廠，職工共 170 餘人，繼而收購了美國煙草公司在上海的全部財產。駐華煙草公司一創立，就同清政府訂立低稅合約，享受優惠稅

捐特權。憑著這些特權，它先後收購了屬中國民族資本的福昌煙公司、大昌煙公司，擠垮三星香煙公司。到抗日戰爭前夕，駐華英美煙草公司已先後在上海、瀋陽、天津、青島以至雲南、四川等地建立 11 家新式捲煙廠、6 家大型烤煙廠、1 間包裝材料廠和 1 間機械廠，同時在山東、安徽、河南等省建立煙草生產基地，並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銷售網絡。它銷售的前門牌、老刀牌、哈德牌、三炮台等老牌子香煙，曾遍及城鄉每個角落，風靡全國。到抗戰前夕，駐華英美煙草公司資本已增加到 21,554 萬銀元，比最初投資增加了一千多倍。<sup>①</sup>這時，它已成為中國捲煙工業的一個最大的壟斷集團。1936 年，駐華英美煙草公司改在香港註冊，逐步將總部遷移到香港，而在 1934 年它已開始在香港建立捲煙廠。直至今日，英美煙草公司仍是香港一家重要的英資公司，壟斷著香港的煙草市場。



英美煙草公司在上海的總部